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正文，作者以宋真宗时期的五位宰相：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与皇帝之间的互动为主要内容，详细考察了宋代承平年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叙述中，作者王瑞来不时插入自己的理解，以为宏观的描述。

对宋真宗二十六年间的史事，笔者了解甚少，因此就政治史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些新信息。在淳化四年（993）的宰执集团大换班中，罢免旧职的理由是当时连绵阴雨百余天，此被归咎于宰相未能调和好天人关系。固然据作者判断这多半是政治斗争的借口，但我们仍能发现，汉代宰相有责调和阴阳、天地的责任仍或多或少被宋代的宰相所继承。

不少学者在谈论宋代的权相时，或是将蔡京作为第一个权相，或是以王安石开了权相之口。作者却认为，真宗朝后期的宰相丁谓，可以算作宋代的第一个权相。不过丁谓虽然任上玩弄权力，恣意罢黜、迁任大臣，但无论是担任宰执的年限（1020-1022）还是其影响力绵延的范围，都比后来可称为权相者有所折扣。因此称呼丁谓为“权相”，大概还是有些勉勉强强。

作者之所以将焦点放在宋真宗时代，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宋真宗是宋代第一位正常继位的皇帝，标志着特殊时代的结束和历史常态的开启。在宋真宗时代的诸多先例，都成为了后来的“故事”被继任者所承袭因循。作者是想以管中窥豹、滴水映日的方式来为历史上的君臣之间的合作与角力呈现一个清晰而细密的具象。

第一部分是从历史的细处着手，第二部分则上升到了宏观层面，作者于第二部分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皇权的认识。简要说来，作者以为中国古代的每个朝代间存在着这样的循环：王朝的创业之主由于在夺取政权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故大权在握；而之后的守成之主，实质性的皇权逐渐下降，象征性的皇权逐渐升高。笔者先前读到其他学者引述本书作者王瑞来的皇权论时，以为其“走向象征性的皇权”仅仅是就宋代立论，且为较长时间段内的趋势，但细细读来作者所写，则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作者等于是另创制了一种“王朝循环说”，只不过对象变成了皇权。如果仅仅就宋代立说，作者的“象征性的皇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正如作者在本书的正文部分所书写的真宗朝宰相故事所揭示的那样。作者本人所擅长的以及钻研的，也是宋代的历史。但如果说要放到整个中国帝制史来考察，作者的说法就要打大折扣了。固然作者所说的开国帝王与继任者帝王之间权势的升降关系确实存在，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不同朝代间皇权所发生的变化。如明代中后期有些时候朝廷的大权确实是被宦官或内阁首辅所掌控，皇帝只不过是垂拱不治，但权力名义上全由皇帝出。而宋代所谓的“士大夫政治”下则有不同，余英时曾考察的“国是”现象说明，权力在名义上也不由皇帝独享。因此，作者的考察只能说在宋代还有些合理性，但却不能说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规律”。这反映出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把握还是有所不足，未能看到不同时期历史的延续、转变与断裂。其最终结论是不可靠的，但其关于宋代史的论述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